



东方的、西方的
哲学的、宗教的
理性的、沉思的
基督教的、儒学的
现代的、全人类的
通往幸福的灵性视角
及中国式探究

Happiness

幸福的奥秘

在比较和练习中指向上帝的至善

(美) 凯利·克拉克 (Kelly James Clark) 主编
郑志勇 译



幸福的奥秘



在比较和练习中指向上帝的至善

(美) 凯利·克拉克 (Kelly James Clark) 主编
郑志勇 译

 世界科学出版社

On Happiness
Chinese-Simplified edition © 2009 Kelly J.Klark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的奥秘/(美)克拉克主编;郑志勇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5012-3712-8

I.幸… II.①克… ②郑… III.道德-关系-幸福-文集

IV.①B82-53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1587 号

图字:01-2009-6808 号

责任编辑 张永椿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张庆棠
封面设计 郭 鹏

书 名 幸福的奥秘
Xingfu De Aomi

作 者 (美)克拉克 主编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100010)

电 话 010-65265919(直销) 010-65265923(发行)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640×960 毫米 1/16 11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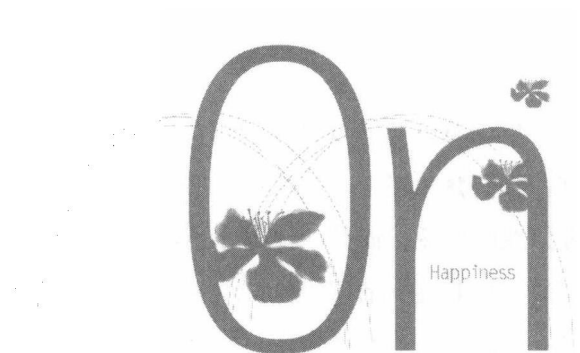
字 数 1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3712-8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幸福在这里

加尔文学院 凯利·詹姆斯·克拉克

幸福是所有人类活动指向的终极目标。幸福的人生是有道德的人生。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求者。那么，怎样才能获得德性呢？亚斯士多德认为，简而言之，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

当浏览西方历史上关于幸福、德性或正义的有影响力的观点时，我们会发现，一些最伟大的西方思想家认为，幸福的生活就是有德性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却不同意这一观点。这可能反映出在我们的一些特定的欲望之间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张力，包括名声、财富、性以及对于美好的追求；而有些时候，我们对于美好的欲望被更多自私自利的欲望所压倒。如果幸福包括对欲望的满足，那么我们最深的幸福是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还是满足美好的欲望呢？

柏拉图笔下最伟大的智者之一——特拉西马库斯认为，坚信正义实际上是对渴望权力、财富、快乐的人们追求幸福的一个阻碍。如果承认他的这种关于人性的观点，那么道德习俗就会被认为是对人类自我实现的障碍。他提出，如果我们可以摆脱不正义，就会得到幸福。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个作为反对并挑战特拉西马库斯对道德和幸福愤世嫉俗的有力论证：为了获得幸福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在我们掌握柏拉图的思想之前，首先要理解两个关键的希腊术语。柏拉图（公元前 427-347），正如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一个伦理学上的幸福论者。*Eudaimonia* 这个术语在英语里被译为“幸福”，后被译为人类的繁荣或实现人类自身官能，甚至是内在的安宁，从而达到一种生命圆满的状态。只有当一个人的所有本性都被适时地展现出来时，才能够达到 *eudaimonia* 的状态。根据柏拉图所论，让 *eudaimonia* 得以实现的是 *dikaiosune*，而 *dikaiosune* 通常被

译为“正义”，这意味着要做一个正义的人，就要拥有正义的品格，即要“正直”。对柏拉图而言，*eudaimonia* 就是 *dikaiosune*，即幸福（人类的完满）就是正义。只有当一个人灵魂的各个部分被正确地安排是才是正直的：当理性控制激情，激情支持理性，而欲望也同样接受这两者的安排。一个正直的人的灵魂是健康的、完整的，是可以充分发挥其自身作用并最终得以实现的，其各个部分在运作过程中都存在一种心理上的和谐，也正因为灵魂的各个部分都在理性的指导下得以和谐、适时地展现其自身作用，一个人才能够得以长远且繁荣地发展。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322）同意柏拉图的观点，即幸福的人生是有道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包含着对于理性的运用。我们最终都是幸福的追求者，因此，幸福是所有人类活动被指向的终极目标。关于这个目标的知识可以帮助指导我们的生活。但是，当我们都同意幸福是最高的“善”时，我们对于幸福是什么却难以达成一致。亚里士多德拒绝把快乐、荣誉和财富作为通往幸福道路的途径，但却通过人类特殊或独特的官能来分辨人类幸福的本质。这个独特的人类官能就是理性。因此，对人类而言，幸福存在于对理性卓越地运用之中，也就是一种有德性的活动。这是所有其他目的应该最终被导向的目的或目标。那么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论，怎样才能获得德性呢？简言之就是：练习、练习、再练习。通过做有道德的活动使自己成为有道德的人，通过不断地重复，德性就变成了一种习惯，继而变成了品格的一部分。

在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的见解中有很多值得赞誉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断言应该拒绝。例如，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除非缓慢且高昂地步行，优雅且绅士地谈吐，出身显赫且拥有一定财富，否则

就不会幸福，且只有男人，自由人，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他把女人和奴隶排除在获得幸福的名单之外。可见，亚里士多德赞同那种蔑视“低一级”人类的德性。耶稣则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给予了一个极低的评价，他谦虚地把自己看成一个奴隶，并将自己的死作为最高的献祭献给那些他所服务的人。

耶稣关于道德的教导中有很大大一部分显示了内在正义的重要性，这表现在正义、宽容地对待别人，就如同对待自己一样。耶稣声称有福的（完满的）是虚心的，是温柔的，是饥渴慕义的，是怜悯且清心的。这种内在的正直表现在对待他人，而不仅仅是对待朋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相信的，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

斯多亚提倡以自我控制的发展作为达到幸福的手段。当我们缺乏名声、财富和健康的时候，就向往它们；而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却忽视它们。我们不能控制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对于财富的增长也影响甚微，而细菌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威力却远大于我们自己。生活中有许多事情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斯多亚的解决方案是：消除对那些不取决于我们的事情的欲望。为了保持内心的平静，斯多亚派建议根据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调整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周遭发生的一切而情感上没有受到困扰，我们就可以获得平静。既然我们不能控制外在的事务，也不能控制他人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于他们漠不关心或者无动于衷（*apatheia*—没有情感上的搅乱）。

中世纪第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奥古斯丁（354–430），把基督教关于幸福的解释与斯多亚联系在一起。奥古斯丁认为柏拉图所论的被正确安排的灵魂都应被理性所控制，而无秩序的灵魂就被过度地与一些事物连系在一起，如权力、名声、荣誉、财富，甚至是被

还原到色欲的爱。奥古斯丁论证说，人被设计出来后不仅要实现这个世界的繁荣，还要爱上帝——这个世界的创造者。被正确安排的爱，渴望上帝作为道德生活的焦点和实现的目标。但是，人类却选择了一种颠倒秩序的爱，亦或是不正义的爱。首个颠倒秩序的爱就是骄傲——对自己的爱超过对上帝和其他人的爱。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以正确的方式爱正确的事物，我们的爱就会被正确地安排，我们就会实现最终的目标（*eudaimonia*—幸福）。

阿奎那（1225-1274）试图将基督教关于德性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谐统一起来。他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的最终目的是幸福——人类繁荣、完满、实现、和平以及满足。他拒绝任何有限的美好事物，如名声或友谊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是有限的。但如果缺乏道德的重新定位，无视上帝的存在，就没有人能够作为一个人而得以繁荣发展。实现这种状态的希望不是取决于我们自然的能力，而是必须依赖于超自然的恩典来拯救。这种信仰、希望和仁慈，不仅让我们了解这些德性，同时还将其“注入”到我们之中。信仰点亮了寻求道德的、实践的、精神的、真理的理性道路；希望把我们的意志导向我们的终极，另一个世界的目的，就像那些我们可以获得的东西一样；而仁慈在我们之中萌生了分享神圣本性的目的欲望。

而近代，幸福与正义却分道扬镳。霍布斯（1588-1679）相信人类是自私的，是勾心斗角且彼此不信任的，我们最深的欲望就是占有和永生，在追求荣誉、争权夺利的同时也寻求和平。而唯一一种以和平的方式使我们得以安全地生活的方法就是放弃自我决定的权利，并将其交给一个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够使我们屈服的公共权力。通过这种存在于自私的人们与集中的权力之间的社会契约，

我们获得了和平、安全，但同时我们自己的意志必须屈服于他的意志，我们的判断也要屈服于他的判断，他会告诉我们如何行动——不要杀人、偷盗或撒谎，要信守承诺、缴纳赋税，同时在社会中保持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行为不是因为他实现了我们最深的欲望，带给我们幸福，而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上给予我们和平。如果放任自流，我们可能会撒谎、欺骗和偷盗。所以，在西方千年历史长河中，幸福与正义首次分道扬镳了。

康德（1724-1804）虽然赞同霍布斯关于人性的否定性的评价，但他仍在努力寻求让幸福与正义在一起的途径。根据康德所论，做好事的唯一的动机就是对于道德法则的尊重。道德法则主张道德是可普遍化的（在相似的处境下，它适合所有的人），同时应该把人当作目的而绝非手段。康德称赞“目的王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其中每个人都把我的目的当作他们的目的，我也把他们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为了能够完全进入“目的王国”，我们需要一种道德信仰，可以将我们的意志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变成以他人为中心。同时我们需要道德希望，即相信存在来世，这表明“目的王国”已经实现，正义与幸福被连系在一起了。

但是，康德的影响让我们发现拒绝道德信仰和道德希望，从而拒绝幸福与正义是可以被连系在一起的确定性。所有这一切都会保持在康德自己的思想中，即我们应该为义务而义务，不管其结果如何。即使遵守责任会让我们痛苦可怜，我们也要遵守义务。

密尔（1806-1873）反对正义与幸福的分裂，他始终捍卫着功利主义：如果行动能带来幸福，就是正义的；如果带来痛苦，就是不正义的。当他把道德和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实际上又把道德与幸福分开了。在他看来，正义的行为就是为了让极大多数人的

幸福，极少数人的痛苦。如果对每一个人在幸福与痛苦之间做出的最好权衡包含着对我的痛苦的要求，这依然是正义的事情。因此，正义或许能也或许不能带来幸福。

尼采（1844–1900）的权力意志伦理学不提供任何幸福。对一个人来说幸福的代价无论是什么，他都赞赏一个人的有创造力、有天赋的自由表现。他认为，只有遭受痛苦我们才能进入完美境界。

我们带着古老的问题进入 21 世纪：幸福存在于正义之中吗？如果幸福包括我们欲望的满足，正义包括控制我们的欲望，那么，这两者如何可能同时发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由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关于上帝/善好的意象）将两者连系起来。中世纪哲人相信通过上帝恩典，可以影响一种道德的转变，且我们被正确安排的欲望可以在彼此之间和上帝那里得到实现。近代世界已从古希腊和中世纪充满形而上学和神学的世界中转移出来，道德与幸福和解的愿望开始消退。康德，也许是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重申道德希望、道德信仰，即上帝在来世会转变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成为“目的王国”的成员。而这却被霍布斯、康德、密尔等思想家自己毁坏了。道德思想家很快将注意力放在行动上，或者抽象的关于“善好”的思辨上，避免触及关于人类幸福的实质性问题，使这个问题依然存留至今：人类的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

在 2007 年清华大学举办的关于幸福的会议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宣读了这些论文。与会的发言人是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杰出学者。这些论文从一个个宽泛的不同的视角提供了关于如何过好的生活的意见——东方的、西方的，哲学的、宗教的，理性的、沉思的，基督教的和儒学的。为会议做出贡献的学者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即我们希望我们的对话可以帮助大家过好的生活，我们也希望

这些论文能够将幸福与正义联系起来，激起独特的关于美好生活的鲜活的中国式探讨。

现在，让我们转入每一篇论文：

在《孔子，公正与进化》一文中，莱恩·尼可尔斯（Ryan Nichols）展现了一个对早期儒家道德心理学的基因学解释。在阐释了他的方法和目标之后，他通过社会本能讨论了道德情感的起源。他认为《论语》和《孟子》关于情感力度和范围的教诲可以反映出一般性归纳结论的假说，并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给出了理由，即具有高度的基因联系作为道德情感以及帮助行为的来源。他谈论了孝、敬，《孟子》的“四端”和孟子对告子、墨子的回应。然后，他为《论语》和《孟子》关于非亲缘的情感力度和范围的教诲，可以反映出一般归纳结论的假设，并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给出了理由，即我们需要提供外在刺激来维持这些情感以及帮助它们所产生的行动。

保罗 W.古奇（Paul W.Gooch）在《关于幸福的若干困惑：希腊的与〈圣经〉的观念》一文中，认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伯来《圣经》以及基督教福音都声称幸福不是生活的目的或目标，但幸福是可欲的。对古希腊人而言，幸福是作为有德性的生活的结果而达到的；在希伯来经文中，幸福来源于遵守律法和上帝的命令。耶稣向他的门徒许诺的不是幸福，而是对永恒生活的祝福，或许这与遭受痛苦自相矛盾，但却是上帝在今生给予我们的礼物，正如来世一样。威胁到幸福的人类存在偶然性，在早期基督教的观点看来，不是被希腊人相信的命运或幸运之轮所掌控，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关爱。

王晓朝在《〈欧蒂佛罗篇〉的中国答案》一文中，试图澄清关

于最近几年出现在中国学术圈关于亲亲相隐的论证的基础命题。这是由对“游叙弗伦”问题的不同阐释和解决而引起的关于律法和仁爱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当我们今天要试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可能的争论和矛盾给出一个分析，去探索它们中间存在的共同之处，然后才能进一步理解律法和仁爱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圣凯在《佛教幸福观的基本原则》一文中，依四圣谛作为佛教幸福观的思想基础，灭谛是最高的幸福，苦谛、集谛是对痛苦的关照，而道谛则是实现幸福的方法。同时，佛教幸福观不仅关注世俗的生活，它更重视智慧的提升，从而将个人的幸福升华到所有人的幸福上，最后实现真正的幸福。所以，佛教是一门生命的幸福以及实现幸福的学问。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除了休谟和康德，在17世纪、18世纪的伦理学领域就没有其他重要的工作了。这个观点之所以存在是因为重要的人物大都同意道德问题应该以基督教柏拉图主义或者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来建构。因此，在近代伦理学思想家的著作中所出现的关于道德的反思，反而显得不那么新颖，其中的一些观点有的正确，有的错误。迈克尔·莫里（Michael Murray）在《莱布尼茨，帕斯卡尔，和人生的意义》一文中，检查了这个时期莱布尼茨和帕斯卡尔两个人物的伦理学工作，考察了每一个人关于怎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

在《康德的幸福学说》一文中，杨云飞对康德的幸福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的解读。文章首先讨论康德的幸福概念，并将主观的满足状态作为康德对幸福的标准理解；其次，对于追求幸福的原则何以不能作为道德的规定依据，论文作出了恰当的解释；第

三，澄清作为德性与幸福之统一的至善的意义与可能性，说明为什么至善只是我们希望的对象；文章最后针对对于他人的幸福如何能够成为我们的道德义务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道德与幸福》一文中，凯利·克拉克（Kelly James Clark）论证了社会契约理论在动机上是有缺陷的，以及有神论为理性自私的个人变成有道德的人提供了更好的动机。他捍卫了在一个共同体中对于死后生活的理性希望，这个共同体与康德的“目的王国”类似。他论证，只要道德的事业可以延续到来世，暂时被道德压制欲望的要求就是合理的。

幸福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吗？斯科特·A.戴维斯（Scott A. Davison）的论文《幸福、良善与节制》比较了亚里士多德、爱比克泰德、托马斯·莫顿、西蒙娜·薇依关于幸福的讨论。虽然莫顿和薇依同意爱比克泰德的观点，即幸福可能独立于对外部事物的占有，但他们却提出了不同的理由。

哈莉特·芭波（Harriet Barber）在《偏好满足的永久可能性》中论证我们偏好的满足——无论是什么偏好——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在目前的讨论中，广义偏好主义者除了从满足人们现实的偏好中获益，满足可能的偏好会让其获益更多。广义偏好主义者陈述了阿玛蒂亚·森的关于主体导向的“能力取向”，并承受了来自玛莎·努斯鲍姆的批评，他们论证指出，关于审慎价值的“主观利益主义”的描述不能与我们关于自由价值的直观或者适应性偏好问题的回应相适应。我们目前的计算能力或自由，从其满足我们的偏好的意义上说，对幸福都是有所贡献的。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立于普遍的西方商业社会的焦点，它推动社会经济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使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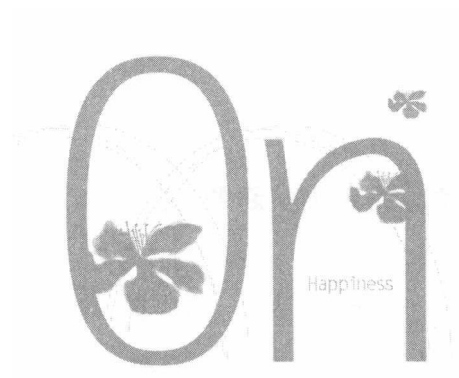
注意力集中在较大的社会秩序上。事实证明，他们具有先见之明，在预计到商业社会的优势的同时也看到了其所承担的事物。正如现在的东方世界，类似的改革正在进行，我们能否从苏格兰哲人的研究中学到一点什么？詹姆斯·R.欧特森（James R. Otteson）认为我们可以，在《苏格兰的启示和人类幸福之悲剧》一文中，他考察了一些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东西，他认为这是一个有意义却发人深省的故事。

最后，代表所有与会者，我要向为会议慷慨提供资金的普雷斯特·梅森（Preston Mason）表示感谢！对王晓朝和朱敦华在清华大学热情友好的招待表示感谢，对汪晓丹将此书稿交付翻译和为出版付出辛勤努力的工作者表示感谢，最后感谢梁颢的校对工作！

目 录

序：幸福在这里 / 3

1. 莱恩·尼可尔斯：孔子，公正与进化 / 1
2. 凯利·詹姆斯·克拉克：道德与幸福 / 17
3. 哈莉特·芭波：偏好满足的永久可能性 / 37
4. 詹姆斯 R. 欧特森：苏格兰的启示和人类幸福的悲剧 / 57
5. 保罗 W. 古奇：关于幸福的若干困惑：希腊的与《圣经》的观念 / 71
6. 迈克尔 J. 莫里：莱布尼茨，帕斯卡尔，和人生的意义 / 85
7. 斯科特 A. 戴维斯：幸福、良善与节制 / 101
8. 王晓朝：《欧蒂弗罗篇》的中国答案 / 111
9. 圣凯：佛教幸福观的基本原理 / 125
10. 杨云飞：康德的幸福学说 / 139



孔子，公正与进化

加州州立大学福乐顿分校 莱恩·尼可尔斯

- 孝心的人类学起源
- 达尔文论情感的进化
- 孔子道德哲学中的偏向
- 从社会本能到人类情感

孝心的人类学起源

格鲁吉亚人——进化树上引人注目且非比寻常的一个分支，177万年前居住在高加索（Caucuses）地区。他们的大脑远比直立行走的人的大脑小得多，并且他们个子矮小，额头宽大。他们能使用简单的砍、切工具，但是他们还没有发现火，因此无法自己烧煮食物，只能以生肉和纤维植物为食。

资源短缺灭绝了先祖、后生代和接近我们基因的物种。即使有足够的资源，后生代和古老的类人猿也无法在极端的冬季下生存。他们要躲避掠食者，在社会组织中保持被提高的社会标准，保证每一个人都受到照顾。格鲁吉亚人（田园智人）这个物种，以及与我们同属的其他物种中那些年长的、处于繁殖后期的成员，在面对多种资源匮乏时同样难逃一劫。即使他们拥有营养资源，对于人类处于繁殖后期和上了年纪的成员来说，他们仍难以活着熬过严寒的冬天、成功地躲避多种肉食动物、继续在一个社会群体中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来确保可以受到他人的照顾。除了以上这些可怕的困难，这些人可能会牙齿脱落，并随之失去咀嚼的能力，在没有火来烧煮食物的情况下，这对于人群的生存而言无疑是致命的。

在格鲁吉亚达米斯（Dmanisi）发现的化石上，显示出那是一个有40岁年纪的老年人——对于那个时期和那些亚种来说，这是不